



The “Lost” Individual: Morality in *The Sun Also Rises*

NAN Jiali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December 20, 2024

Accepted: January 16, 2025

Published: March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NAN Jiali. (2025). The “Lost” Individual: Morality in *The Sun Also Ris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058–06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0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06>

Abstract: *The Sun Also Rises* is a refutation of the “lost generation” rather than a “lost” narrative. By depicting Jack’s change from indulging in personal space to returning to social relations, Ernest Hemingway endows the social choice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with new moral connotations. This writing not only refutes Gertrude Stein’s critique of post-war American writers but also shows Hemingway’s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himself and his peers in literary history.

Keywords: *The Sun Also Rises*; Ernest Hemingway; the Lost Generation; moral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NAN Jial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t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Her interests include nineteenth-century an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ecocriticism.

「迷惘」的個人 ——《太陽照常升起》中的道德因素

南佳麗

南京大學

摘要:《太陽照常升起》與其說是「迷惘」敘事，不如說是「迷惘的一代」一詞被證偽的文學現場。通過刻畫傑克從沉溺個人空間到回歸社會關係的變化，海明威賦予「迷惘的一代」的社會選擇新的道德意涵。這一書寫不僅駁斥了斯泰因對戰後美國作家的負面評價，更展現出海明威對自身以及同輩作家的歷史定位與反思。

關鍵詞:《太陽照常升起》；歐內斯特·海明威；「迷惘的一代」；道德



一、引言

《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6) 是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第一部長篇小說, 講述了主人公傑克 (Jake Barnes) 和勃萊特 (Brett Ashley) 相愛卻因困於現實處境不能結合的故事。長期以來, 學界對該小說的研究都圍繞斯泰因 (Gertrude Stein) 卷首語「迷惘的一代」而展開, 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展現了「迷惘的一代」「冷淡、疏離」的情感現實^①。然而, 事實卻是, 海明威本人並不認同斯泰因對包括他在內的戰後美國作家的評價: 他曾在回憶錄中直言「她那些「迷惘的一代」的胡謔和所有信手拈來的骯髒標籤, 全給我見鬼去吧」。這與海明威在小說卷首將「迷惘的一代」和出自《聖經·傳道書》的「太陽照常升起」進行對比的做法如出一轍。在他看來, 「每一代人都曾由於某種原因而感到迷惘, 過去是這樣, 將來也是這樣」^②。為此也有學者開始重新思考海明威創作《太陽照常升起》的初衷, 提出在小說中「海明威實際上通過將『失去』放置在他文學計畫的核心位置, 直接、吊詭地回應了斯泰因的挑釁」^③。

受此思路啟發, 本文擬從傑克的社會關係入手, 探究道德因素在海明威創作《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意義, 而後聚焦於海明威的戰後美國作家身份, 嘗試提出以下觀點: 《太陽照常升起》與其說是「迷惘」叙事, 不如說是「迷惘的一代」一詞被證偽的文學現場。通過刻畫傑克從沉溺個人空間到謀求社會關係的變化, 海明威賦予「迷惘的一代」的社會選擇新的道德意涵。這一書寫不僅駁斥了斯泰因對戰後美國作家的錯誤理解, 更由此樹立起新生代作家嶄新的時代形象, 展現出海明威對自身以及同輩作家的歷史定位與反思。

二、「等價交換」原則與非道德的個人

《太陽照常升起》出版於 1926 年, 描摹了一戰後流亡在巴黎的美國青年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當時人們的生活帶來了重大影響。大戰不僅毀滅了數不盡的年輕生命, 更剝奪了他們的青春想像和對崇高理想的信念。這使得戰後的年輕一代對政治多抱有無所謂的態度, 進而選擇逃離國內日益加劇的保守政治氛圍^④。小說中的傑克就是這樣一位「流亡者」^⑤。由於他在戰爭中失去了性能力而無法與深愛的勃萊特結合, 他選擇在戰後來到巴黎, 終日飲酒、調情, 過著日復一日麻醉自己的生活。

傑克在巴黎有一套獨特的生活處世之道。他主張「世界是個很好的市場」, 「只不過是等價交換」, 「享受生活的樂趣就是學會把錢花得合算, 而且明白什麼時候花得合算」^⑥。從這裡可以看出, 傑克把生活看作一筆筆交易, 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換算成一串串等價的數字, 知識、經驗、機緣在他口中和錢財無異, 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交換的, 「把錢花得合算」成為了他「享受生活的樂趣」、忘記現世煩惱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個層面上, 傑克消解了「道德」的意義。人與人之間變得沒有對錯, 沒有了「報應或懲罰」^⑦, 也就由此擺脫了道德的評判。人與人之間只有「自我」, 沒有「他人」, 更沒有「社會」。作為世人眼中「迷惘的一代」, 傑克找不到傳統道德在現實世界的立足之地, 卻又苦於無路可走, 只能選擇將「道德」懸置, 放任自己在精神上的迷失。

傑克的情況不是個例。事實上, 當時整個巴黎的社會風氣都是如此。巴黎在戰後聚集著各色人等, 包括「邊緣藝術家、閒散的有錢人、嚴肅的畫家和作家、年輕的暴徒、爵士樂音樂家、黑人舞者」等。美國人在這裡可以不受國內禁酒令的束縛而盡情歡飲, 爵士樂樂聲在深夜綿延不絕^⑧。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影響下, 傳統的道德理想被質疑甚至被捨棄, 而新的道德規範又尚未確立, 人們被置於道德的真空之中而不自知。正如傑克在小說中所說, 「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我並不在意。我只想弄懂如何在其中生活」^⑨。

這是傑克的困境, 更是「迷惘的一代」的普遍困境。正如傑克對他所奉行的「等價交換」理論的調侃一

樣,「再過五年,這種理論就會像我有過的其他高超的哲學理論一樣,顯得同樣的荒唐可笑」^⑩。對傑克們而言,一戰後,傳統道德失去在現實世界的立足之地,所有「高超」的事物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荒唐可笑」的面目。然而,他們身處這樣一個世界卻無處逃脫,只能像一葉浮萍漂遊在歐洲各地,脫離土地、脫離社會、脫離現實,轉向虛無的個人世界找尋安慰。對他們來說,「等價交換」原則製造了一個和現實世界隔絕的虛擬世界,是他們賴以維持活下去信念的支撐,這既是一種精神的流浪,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的自我療愈。因此,面對比爾對自己「矯揉造作」「高談闊論」「不務實事」的一系列指責,傑克並不反駁,反而戲謔地回道,「照你這麼說,這種生活倒蠻舒服嘛」^⑪。

三、社會化身份與道德的回歸

不過,儘管傑克自詡樂得「等價交換」的好處,但他仍身處與勃萊特的情感糾葛之中。他所抱怨的「女人,還啊,還啊,還個沒完」,指的就是與勃萊特的「帳單」^⑫。他傾心於勃萊特,分擔她的痛苦,卻無法與之結合,還要忍受後者接連不斷的新戀情。但即便如此,在小說結尾勃萊特說出「我們要能在一起該多好」^⑬時,傑克給出的回答仍是肯定的。這是因為,傑克與勃萊特都是戰爭的受害者,這種相似性將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以傑克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建構起了他們的社會性。他們同病相憐,對對方的遭遇感同身受,從而能夠相互理解,相互依偎。如果說在小說一開始他們在酒精和情欲中集體放縱自己的話,那麼在西班牙他們則一起享受觀看鬥牛帶來的刺激。他們自始至終都是以一個群體的面貌出現的,而不是單一的個人形象。

這在傑克與佩德羅(Pedro Romero)和羅伯特(Robert Cohn)對待勃萊特的不同態度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佩德羅和羅伯特並不屬於「迷惘的一代」,二人無法理解也無法融入這一團體。雖然他們共同愛著勃萊特,但佩德羅為了不讓自己「丟面子」^⑭希望勃萊特留起長髮,羅伯特則一廂情願地將勃萊特與他共度的一周當了真。因此,在小說中,佩德羅最終還是離開了勃萊特的生活,而勃萊特再一次在傑克的懷抱中感到了「舒適」^⑮,並聲稱要回到邁克的身邊。在這個意義上,傑克的社會性得以彰顯。儘管他以個人主義為信條,但他仍生活在社會性的現實情境之中,保留著與勃萊特以及「迷惘的一代」的同伴的關係,從而為道德的救贖留下了無限的可能。

因此,如果說在小說的前半部分「迷惘的一代」在海明威的筆下懸置了道德,那麼隨著他們的形象被刻畫得越來越清晰,讀者就會認識到,這一群體實際上始終懷有對道德的企盼。其中,比爾(Bill Gorton)就起著「從享樂主義價值觀轉向傳統道德」的重要作用^⑯。這在比爾的出場中就有了暗示:

比爾·戈頓到了巴黎,在我的住處待了兩天就到維也納去了。他興高采烈地稱讚美國好極了。紐約好得不得了。那裡的戲劇季節規模宏大,還出現了一大批出色的青年羽量級拳擊手。其中每個人都大有成長起來、增強體質並擊敗登蒲賽的希望。比爾興致勃勃。他新近出版的一本書給他掙到了一大筆錢,而且還會掙得更多。他在巴黎這兩天我們過得很愉快,接著他就到維也納去了。他將于三周後回來,那時我們將動身到西班牙去釣魚,然後去潘普洛納過節。^⑰

比爾來自紐約,但卻並不像傑克對那裡滿懷厭惡,相反,在他眼裡,美國到處都充滿了變化與生機。與此同時,比爾也愛飲酒,愛享樂。這種雙重特徵使得比爾對「迷惘的一代」的享樂生活和正在發展中的現實世界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他在向傑克講述了國家和自己的發展之後,很快就制定了和傑克一起旅行的計畫,傑克不僅就此在巴黎有了無所不談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在比爾的帶領下,傑克到西班牙釣魚、觀



看鬥牛,重新體驗到現實生活的樂趣。這在下麵這段哈裡斯(Harris)與傑克、比爾的對話中得到了充分地體現:

「咳。你們不瞭解,對我來說在這裡和你們相逢的意義有多麼重大。」

「我們過得再快活也沒有了,哈裡斯。」

哈裡斯有點醉意了。

「咳。你們確實不明白有多麼大的意義。大戰結束以來,我沒有過多少歡樂。」

「將來我們再約個日子一起去釣魚。你別忘了,哈裡斯。」

「一言為定。我們一起度過的時間是多麼快活。」^①

在這裡,三人都感受到了情感的回應。哈裡斯也曾經歷一戰,並為此留下了傷痛的記憶,這使他與「迷惘的一代」發生了強烈的共鳴,因此和傑克、比爾成為了把酒言歡的朋友,共同度過了歡樂的時光。這種轉變背後隱藏著的其實是傑克道德態度的變化,他的非道德立場在這裡已經不再強勢。通過與他人建立情感關係,傑克重新進入社會語境之中並承擔起對他人、社會的責任,完成了社會化意義上的道德救贖。

事實上,在現實世界中,「迷惘的一代」最終也像傑克一樣走向了對道德生活的回歸。「在變化的世界中,青年人面臨著一個更新道德觀念的任務」^②。「他們痛苦而尖刻地攻擊自己的國家,但幾年後,又完全出於思鄉之情而紛紛回國,定居在沿海各島上或新英格蘭的農場裡,並寫出了在更古老、更世故的歐洲社會影響下醞釀成熟的作品」。「『迷惘的一代』實際上並不迷惘」。他們看似放蕩不羈,但其實從未消沉,他們的「迷惘」更像一種百轉千回的情感體驗,是道德觀念交替階段人們內心所必經的震盪。「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為美國奉獻了文學史上最富有生氣、最新穎、最激動人心的作品」^③。而這也正是《太陽照常升起》的旨趣所在。

四、結語

作為一部一戰後的作品,《太陽照常升起》敏銳地捕捉到了戰爭帶給人們的心理創傷與道德態度的轉變。在小說的結尾處,勃萊特與傑克得到了短暫的共同相處的時光。雖然二者仍面臨要分別的結局,但對於「在一起」的想法傑克已經有了新的態度。因此,對傑克來說,他的回答「這麼想想不也很好嗎?」^④並不是一種對現實的妥協,而是表現了對真實生活的坦然面對。這一回答雖然平淡,卻也充滿了生命的力量,展現了傑克在經歷道德救贖之後直面現實困境的勇氣與決心。正如特裡林(Lionel Trilling)所說,「海明威想做的第一件事似乎就是要擺脫那些『感情』,那些舒適的自由人文主義感情,並用真理來取代它們」^⑤。「作為一個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海明威對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深感憂慮」^⑥。通過刻畫以傑克為代表的戰後青年在現實困境中質疑道德的意義並由此沉落於個人的虛幻世界,但最終在社會關係中重新找到了道德迷途的出口,海明威試圖警示人們,在戰爭面前,理想化的自由人文主義既不能帶給人們道德的意義,也不能展現戰後青年真實的道德狀態。這不僅表達出海明威對他所在時代道德危機的思考,更傳達出他身為一名寫作者的歷史擔當。

注釋

① Gottlieb, M. I. (2018). The “pretty” lost generation in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 *The Explicator*, 76 (2), 75.

② 海明威(著),孫強(譯):《海明威回憶錄》,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頁23-24。

③ Tomkins, D. (2008). The “lost genera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loss: Ernest Hemingway’s materiality of absence and *The Sun*



Also Rise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4 (4), 745.

④⑧ Reynolds, M. S. (1988). *The Sun Also Rises: A novel of the twentie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2.

⑤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⑰⑱海明威(著),趙靜男(譯):《太陽照常升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頁87-315。

⑯Brenner, G. (1983). *Concealments in Hemingway's work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45.

⑲⑳羅德·W·霍頓,赫伯特·W·愛德華茲(著),房煒,孟昭慶(譯):《美國文學思想背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頁353+358-359。

㉑特裡林(著),嚴志軍,張沫(譯):《知性乃道德職責》,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頁13。

㉒覃承華:《論海明威文藝思想與其旅居生涯的關聯性》,《外國語文》,2024年第3期,頁82。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